

数字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探析

沈磊,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4)

摘要: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 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话语呈现出虚假信息泛滥、过度商业化、观点两极化等异化现象。公共话语异化现象产生的本质是大众在互联网世界中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 以狂欢的形式, 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网络传播的回音室效应造成公共话语异化程度日益加剧。确保公共话语真实性, 保持客观理性, 明辨话语事实和真相, 是我们走出公共话语异化困境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 公共话语; 异化现象; 数字技术; 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2-0099-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0204046

Exploring to the Alien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Digital Era

SHEN Lei, XIN 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Jiangsu)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y, the alienation phenomena of public discourses occur in the public areas, such as prolifer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over-commercialisation, and polarisation of opinions. The essence of such an alienation is that the public tend to become “the crowd” on internet and re-dominate discourse power in the form of carnival. The echo chamber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has led to the increasing alien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Ensuring authenticity of public discourse, maintaining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 and discerning the facts and truthful discourse are 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alien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Keywords: public discourse; alien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discourse analysis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J.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所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亦译作“公共空间”)一词。Habermas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解的一个领域。”^[1]学界普遍认同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定义, 即“从国家和

社会的两极中独立出来, 公民阶层的第三方力量, 为私人话语提供交流公共事务的平台”。公共话语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和话语的内容与形式的总和”^[2]。公共话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直是社会科学、语言学、通信研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公共话语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24-02-04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19YYA003)

作者简介: 沈磊,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英汉对比与翻译。E-mail: swanwheel@163.com

通信作者: 辛斌, 男, 教授。研究方向: 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E-mail: 13770501252@163.com

研究人员探析了公共话语潜在的社会因素、认知因素和语言特质,以及公共话语对公众意见和行为的影响。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社交媒体激增,公共话语空间信息交流爆炸式增长。一方面,公共话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观点和分享自己经验的平台,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公共话语经常被扭曲或改变,以服务于某些特定的利益。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帮助确定公共话语被改写和被操控的原因和方式,探析其背后的动机,进而了解公共话语在数字技术时代所遇到的挑战。

一、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

以互联网和全球化为重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纸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公共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发生在社区或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开辩论,是一种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以及人们思考方式的交流方式。这种形式的话语促进不同团体或个人思想之间有意义的沟通和辩论,也是促进公民社会参与和社会理解的一种手段。公共话语包括公共论坛、会议、演讲、辩论和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可以让不同背景的团体或个人在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环境里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和意见。通过公共话语空间,人们可以更好地增进了解,分享经验,并寻求所面临问题的共同点和解决方案。数字技术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的巨大空间,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快捷地获得信息和参与信息共享与交流。数字技术的兴起在促进人们表达个人情感、表达公共诉求、帮助公共决策、提升民主公正和公民意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数字公共话语空间的兴起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虚假消息的传播、舆论的资本控制等。数字公共话语空间的发展超过一定的界限和规约,就可能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规则严重异化的混乱场域”,即成为巴赫金所定义的“狂欢世界”。这种异化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Gustave认为:“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合流成群体后,个体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当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时,个体往往具有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大众倾向于成为‘乌合之

众’,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3] Habermas在提出公共话语空间概念的同时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电子传媒正对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传播媒介的拓宽和信息渠道的多样让公共领域的信息量不断扩大,对公共话语的批判性思考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异化”一词在哲学上的意义是指当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力量。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r)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又称劳动异化。马克思用这个词来概括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4]“异化劳动”一词用以表现和描述资本主义的邪恶本质,异化概念反映了

“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作用于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由于人的能动性的丧失,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得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2]。学界引入“异化”一词,来描述公共话语中的这些背离公共话语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负面表现和消极影响。

二、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现象之表现

在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如虚假新闻盛行、公共话语的过度商业化、观点极化现象以及不道德化趋势都进一步破坏了公共话语的原始属性。原本是公民平等地发表意见,讨论公共事务,享有理想化的话语权的公共话语空间,因为日益明显的异化现象,其客观承载公共意见的性质受到侵蚀。

(一) 虚假新闻

公共话语异化现象最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虚假新闻(fake news)的传播。fake news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批评媒体时的口头禅之一,因为广为人知且被广泛使用,成为柯林斯词典的2017年度热词。柯林斯词典指出:“‘假新闻’在21世纪最初十年(2000—2010)

开始被美国电视用于描述“错误的、煽动性的、以新闻报道为幌子散播信息’。”^[5]2015年以来,该词使用率一直攀升。这个短语被认为是特朗普前总统的语言修辞特征。根据 Allcott 等学者的定义,虚假新闻是“故意发布的、可被证明确实是虚假的,可能误导读者的新闻文章”^[6]。他们断言,虚假新闻广泛传播对公众舆论和话语产生了重大影响,往往导致错误信息广泛传播和社会信息紊乱。Allcott 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盛行,用户可以“快速、轻松地传播和分享虚假信息”^[6]。由于数字技术的便捷和网络极快的传输速度,虚假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和核实。虚假信息的迅速广泛传播,对公共话语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活动的关键几个月里,虚假新闻的破坏力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此期间,前20个经常讨论关于选举的虚假新闻在脸书(Facebook)上产生了871.1万次分享、反馈和评论,比19个主流新闻网站发布的前20个讨论最多的选举事宜的736.7万次还要多。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社交媒体是大选新闻的重要来源,但并不占主导地位,14%的美国人称社交媒体是他们“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在大选前三个月出现的已知虚假新闻中,支持特朗普的新闻在Facebook上总共被分享了3000万次,而支持克林顿的新闻被分享了800万次;在大选前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成年人每天都阅读到假新闻,而在回忆起看到过假新闻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相信了这些新闻。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虚假新闻是对民主、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之一。在转发量上,推特(Twitter)上的假新闻通常比真实新闻被更多的用户转发,传播速度也快得多,尤其是虚假的“政治新闻”^[7]。经济方面虚假新闻的传播则往往导致股票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和大宗交易产生。

虚假新闻并不是一个“新现象”^[8]。韦氏词典注解,该词词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有关表达最早在1890年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词之所以成为现在被广泛关注的话题,是因为与报纸和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相比,“虚假新闻在网上的创建和发布更加快捷”^[9]。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加速信息传播的理想平台,社交媒体打破了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障碍,提供了丰富的分享、转发、投票和评论平台,并鼓励用户参与和讨论网络新闻。这种围绕网络热点激增的新闻,往往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关注和信任。

此外,如果读者个人反复接触虚假新闻,或者如果虚假新闻恰好符合其个人期待和固有信念,他们就非常倾向于相信虚假新闻,且因为网络传播的“回声室效应”,这种不实的信息传播效应往往会被“放大”和“强化”^[10]。

虚假新闻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但可能左右人们的观点和判断,甚至可能“控制”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正如“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选为国际年度词汇所表现出的社会学意义,“后真相”的“后”字,更确切地阐释了真实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同的人只选择相信符合自身偏好和认知的信息。客观事实影响变小,而个人情感、认知和信仰则产生更大影响。舆论分裂和观点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和相信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将其当作“真相”。

虚假新闻并不完全是通过恶意篡改或捏造而成的。类似“穿井得一人”,谣言越传越谬误的新闻失真现象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中屡见不鲜,一些消息本身在传播过程中会选择性有意或者无意失真。这种偏离了客观事实或新闻标准的新闻失真现象,例如,用“旧闻充当新闻”,片面放大个案的普遍意义,利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人为处理手段拼接甚至编造新闻事实,很容易引发民众关注和舆论震动^[11]。

(二) 过度商业化趋势

公共话语过度商业化是公共话语异化现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早在1993年,Fairclough就关注到公共话语的市场化问题,他以大学学术职位海报为例,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解析了例证中“令人厌恶的”“高度宣传的”“市场化”的措辞^[12]。Fairclough还研究了公共话语的商品化,讨论了这个过程涉及宣传(商品、服务、机构或人)功能的普遍化,继而说明公共话语“对话化”在广义上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13]。几十年来,公共话语的商业化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人们认为过度商业化对公共话语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各种商业利益优先于公众利益的商业广告,在公共话语空间广泛、重复地播送,深刻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和判断。Beck认为:“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秩序的特点是日常生活的无情地商业化。”^[14]这种现象被认为是对公共话语的不利影响,营销和广告策略的无限扩展,以及个人和组织的“品牌化”的兴起,导致商业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大量短期的、

商业利益驱动的传播的兴起导致公共话语的质量和深度不断下降。此外,媒体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增加,可能导致其故意扭曲事实,以吸引大量的关注和创造更多的收入,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研究表明:“媒体对利润的追求损害了产品的质量,为了吸引大量的观众关注而采用耸人听闻和歪曲事实的做法。”^[15]随着商业媒体的兴起,公共话语越来越被某些资本主导,且往往是被“拥有最响亮扩音器”的声音主导,这就导致不同的主张被压制,特别是那些资源较少、接触媒体渠道较少的发声被压制,少数人和被边缘化的人发声困难甚至无法发声,“公共话语同质化趋向日益严重”^[16]。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公共话语商业化是造成公共话语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观点极化趋势

近年来,公共话语观点两极化现象(Polarization of Opinions)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这个现象被认为是公共话语异化的另一表现。公共话语观点变得越来越敌对,进一步加深了对立双方的意见分歧。社交媒体的激增和数字技术让人们更加自由和便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加剧了双方意见的对立。公共话语在很多热点问题上呈现高度两极化,以至于公众很难再找到一个中间立场,进一步的立场固守,让双方很难达成共同点,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Conove等人用网络聚类算法和人工注释数据结合的方法,研究了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6周的25万多条推文,证明了政治转发表现出“高度隔离的党派结构”,“左翼和右翼用户之间的联系极为有限”^[17]。而且,在线论坛、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空间中的公共话语辩论往往是由强烈的个人情绪驱动的,双方激烈争辩,绝无通融。网上的两极化话语经常导致“我们与他们”的社会心态的产生,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分裂”^[18]。

(四) 不道德化趋势

公共话语不道德化是一个困扰社会数百年的现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激增加剧了公共话语不道德化的进程。在网络上,人身攻击、话语霸凌、党派相争和社交媒体的嘲弄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因为用户可以任意发表个人意见,简易快捷地传播虚假信息,而无需承担责任(至少不必立即承担恶意传播的责任)。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和无厘头的口水大战屡见不鲜,网络水军层出不穷。

Runions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线环境中“社会情感线索的匮乏”“社交网络传播的便利性”“个人情感淡漠”,以及“个人责任的淡化、延迟和转移”,为道德约束的脱离提供了便利^[19]。所以,在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个人失去客观理性,促使网络攻击和网络欺凌的发生。

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原因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公共话语空间扩展的技术支撑,同时也是导致公共话语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回音室”效应中,观点相似的人往往聚集在一起,互相不断强化己方的信念,隔绝反对的观点,这使公共话语更加分裂,双方很难产生有意义的沟通和对话。作为群体成员身份的公共话语者在网络世界里也更趋向于无意识人格存在,因而人性的弱点也是造成公共话语异化的原因之一。

(一) 新媒体的特点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扩展了公共话语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空间,同时也是造成公共话语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数字技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便利性,减少了人们对传统交流形式(如书信、面对面交谈和其他形式的书面话语沟通)的需求。Omernick等通过使用语言学调查和字数统计工具的分析研究发现,实名评论中“脏话词汇”“愤怒词汇”“消极情绪词汇”会少一些,而“积极情绪词汇”会更多^[20]。数字技术支持用户在公共话语空间中隐匿真实身份这种匿名在线互动形式会导致更高水平的不文明行为,因为在匿名条件中,用户往往不能像以真实身份那样用积极负责的方式行事。此外,数字信息的快速交流会降低人们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下降,快节奏的数字传播环境导致对知识和信息的理解深度和广度普遍降低。因此,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公共话语的质量,进而导致更多更深刻的异化现象。

(二) 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回音室效应也是公共话语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网络空间内,人们经常接触相对“同质化”的人群和信息,阅读或听到非常相似的评论,就会倾向于将其当作真相和真理,个人认识和理解逐步变得故步自封甚至偏执极化。这种信息、想法甚至信仰

在一个“封闭”系统内的传播和重复且被“放大”或“加强”的现象被称为“回音室效应”^[21]。人们倾向于从观点相似的人或者消息来源处获取信息,从而减少信息获得成本。在人性本能和数字技术支持双重驱动下,“回声室效应”和“信息茧房”成为当前网络信息特点之一。在公共话语空间里,回音室效应缩小了话语和观点的范围,导致异见缺失或者对异见的理解不足。同质化的聚集让人们减少了接受多元化声音的可能,人们在各种碎片信息甚至泛滥不堪的虚假信息中,逐渐失去了多元解读和深度理解的能力。当一群人选择优先与观点相近一方加强联系,而排斥疏离其他人或者其他观点时,就形成了“回声室效应”。这个社群“形成得越充分,即群体内部建立的联系越多,群体就越是与外界的观点隔绝,而其成员的观点就越能在群体内广泛传播”^[22]。因此,同样的观点在社群内不断被重复、强化和巩固,很少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其他观点的发声被遏制和淡化,公共话语的异化程度就会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逐渐深化。van Dijk认为,这种“回音室”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并“可能预示着公民社会的重要变化”^[23]。

(三) 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也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公共话语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作为普通人,人们很容易产生自私和分裂的个人情感倾向,在日常生活中更关注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整个社会的需求。在匿名和真实身份隐身的网络环境中,人们更多地是作为群体成员身份参与公共话语。Gustave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曾经有这样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而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3]于是这些群体成员不再受自己的理性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作为群体成员身份的公共话语者,看客心态和娱乐心态促使人们并不愿意进行有积极意义的对话或寻求共同点;而人们不愿意参与积极话语沟通,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和观点,造成的理解和沟通不足,又进一步导致公共话语异化程度的加深。

四、公共话语异化问题解决之道

公共话语空间本质就是为人们提供自由的、公

共的话语交流的互动平台,是人类社会交往进步的产物之一。当今,公共话语空间因为数字技术的进步,公共话语的数量激增,形式多样,人们的参与深度和广度大幅度提升,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异化现象作为对公共话语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背离,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应对之技。首先,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健全社会规则,加强数字平台内容的监管,努力确保在数字公共空间分享的信息是准确的、可信的和基于事实的。可以通过事实核查、核实原材料等策略来实现信息发布的真实性,确保公共话语是基于事实的有意义的讨论,而不是虚假信息或煽动性言论。第二,鼓励数字公共空间里自由的、积极的对话,例如在线聊天或者主题论坛等,让人们可以自由讨论,比如使用视频会议软件,如 Skype 或 Zoom 等在线会议软件,促进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之间进行实时对话,建立有意义的人际联系,而不是简单地发布基于文本的单向评论。更多的言语互动可以有效加深彼此理解,减少观点极化现象,降低“回音室”效应。第三,鼓励所有人平等参与数字公共话语空间讨论,确保所有的声音都能被听到,并积极参与有意义的讨论和解决方案的设立,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同时,也要帮助用户提升批判性地评估公共话语,识别偏见话语或虚假信息技能。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虚假新闻的传播、过度商业化、公共话语不道德化和观点两极化是公共话语异化的重要表现,造成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的本性弱点等。传播的“回声室”效应不断加剧公共话语异化程度。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关切和重视。在面对当今纷沓而至的公共话语时,我们要保持客观和理性,要清醒地认识到异化现象给人们带来的信息蒙蔽和刻意策动,要认清事实真相,探求话语本质意义。只有保持充分警惕,明辨是非,我们才能走出公共话语“乌合之众”的泥潭。

参考文献:

- [1] HABERMAS J.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 Society[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9.
- [2] 赵璐阳, 尚重生. 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及其回归[J]. 江汉论坛, 2016(8): 129–133.
 - [3] LE BON G.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M]. Massachusetts: Courier Corporation, 2002.
 - [4] MARX K.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estranged labor[C]/LONGHOFER W, WINCHESTER D. Social Theory Re-Wired: New Connections to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58–164.
 - [5] FLOOD A. Fake news is “very real” word of the year for 2017[EB/OL]. (2017-11-02)[2024-03-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nov/02/fake-news-is-very-real-word-of-the-year-for-2017>.
 - [6] ALLCOTT H, GENTZKOW M.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2): 211–236.
 - [7] VOSOUGHI S, ROY D, ARAL S.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J]. *Science*, 2018, 359(6380): 1146–1151.
 - [8] TANDOC E C JR, THOMAS R J, BISHOP L. What is (fake) news? Analyzing news values (and more) in fake stories[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21, 9(1): 110–119.
 - [9] SHU K, MAHUDESWARAN D, WANG S H, et al. Hierarchical propagation networks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exploit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Limassol: AAAI Press, 2020: 626–637.
 - [10] JAMIESON K H, CAPPELLA J N. Echo Chamber: Rush Limbaugh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Establish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1] 王京育.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失真问题与防范对策[J]. 中国记者, 2021(7): 103–104.
 - [12]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The universities[J]. *Discourse & Society*, 1993, 4(2): 133–168.
 - [13] FAIRCLOUGH N. Conversational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umer[C]/ABERCROMBIE N, RUSSELL, KEAT W.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um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245–259.
 - [14] BECK T, DEMIRGUC-KUNT A, LEVINE R. 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M]. Washington: World Bank Group, 1999.
 - [15] GILLESPIE T.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C]/GILLESPIE G, BOCZKOWSKI P J, FOOT K A.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2014: 167–194.
 - [16] LEMERT C C, GILLAN G. Michel Foucault. Social Theory and Transgression[M].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7] CONOVER M, RATKIEWICZ J, FRANCISCO M, et al.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C]/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Limassol: AAAI Press, 2011: 89–96.
 - [18] KARAGIANNOPOULOS V.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political struggles: Some conclusions from Iran and Egypt[J]. *New Political Science*, 2012, 34(2): 151–171.
 - [19] RUNIONS K C, BAK M. Online moral disengagement, cyberbullying, and cyber-aggression[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5, 18(7): 400–405.
 - [20] OMERNICK E, SOOD S O. The impact of anonymity in online communities[C]/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Alexandria: IEEE, 2013: 526–535.
 - [21] DEL VICARIO M, BESSI A, ZOLLO F, et al. The spreading of misinformation onlin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3): 554–559.
 - [22] GUESS A, NYHAN B, LYONS B, et al. Avoiding the echo chamber about echo chambers[EB/OL]. [2024-03-11]. https://kf-site-production.s3.amazonaws.com/media_elements/files/000/000/133/original/Topos_KF_White-Paper_Nyhan_V1.pdf.
 - [23] VAN DIJK J A G M. Digital democracy: vision and reality[C]/SNELLEN I, VAN DE DONK W.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Revisited. Amsterdam: IOS Press, 2012: 205–214.

(责编: 朱渭波)